

普通百姓写自传的历史意义

往日里,熟读《史记》的邹振东常常会做这样的追问:汉代的家庭怎样用五谷烹制三餐,周转不济时该向谁借贷,生老病死如何操持?但是,“流传至今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应该建构于个体的常态的历史,反而消失不见”。

“父亲不是英雄,也不是明星,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叙述历史的权利。”这位历史学博士说。因为读博士时受到新史学观的影响,他从不轻视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看来,在表现同等生活状态上,底层与精英同等重要。人们多研究精英历史,很大程度上源于精英们可以书写,可以被记录,因此才可被后人追崇,“归根结底,精英有发声的渠道,但平民没有”。

“正因如此,很多人都认为宏观历史就是炮灰。”这位长期从事精英史的学者指出,读者对底层历史的追捧不仅是因为书中的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共鸣。长久以来,两种历史观占据了社会的核心,一种是背后往往带有政治目的的宏大叙述,另一种则是过度以西方为中心,强调一切都在进化的现代性史观。现在,二者“都在遭受质疑”,因此“草根自传必然会受到欢迎”。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则给出了这样的论断。在物权、产权、消费者权益都日渐受到重视的今天,对历史的要求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权利,

“这种权利正在得到社会认同,这是整个社会开放和进步的一个标志”。

连续10年来,郭于华和她的团队在东北、河北、陕西、四川的四个村落做农民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长年坚持,使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甚至去的次数多了,“我们现在都可以用方言跟老乡讲活了”。

在多数人眼里,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所以团队直到现在都很难找到资金支持。但在收集者看来,农民口述史和平民自传一样,只有通过这些记录,才可以真实地看到一个人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结。

郭于华和一个陕北农妇聊天时,农妇向她讲述了儿子刚出生时的情景。以前那个地方的女人不需要下地干活,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老人孩子、纺织布匹、裁衣纳鞋,只有农忙那一阵,女人才会跟着男人下地撒种子。但那个农妇的儿媳生那年,一夕令下,不论男女,全村人都要下地干活了,不干活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得饿死。田在山上,离家特别远,她只好找了根布绳,天一亮就把还没断奶的娃娃拴在炕上,晚上回来,孩子一整天都饿着肚子,哇哇大哭,屎尿涂得全身都是,这位母亲只有半夜里抹眼泪。而那一整天她都没时间织布,孩子一岁大了才第一次有衣服穿。

其实也正是那一年,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开

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如果没有农妇那样卑微的生存和琐碎的记忆,“我们”无从得知在宏观历史下真实的生活状态”。

“可是人们一直忽视自己的个体价值。”郭于华感叹。她在搜集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对回忆往事感到不知所措的农民,最常从他们嘴里获得的答案,总是“那都不过去了么,我们农民这点事,有什么可说的”。

“人为什么不重要?普普通通的村民村妇,不是也和共和国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吗?”郭于华总是这样告诉她的研究对象。很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应该被遗忘,“因为在历史面前,人应该是平等的”。

郭于华还经常会以各种方式提到孟令骞——著名地主“周扒皮”的曾外孙。今年年初,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孟令骞5年田间调查采访后写成的家族史《半夜鸡不叫》。在那个耳熟能详的“半夜鸡不叫”的故事中,周扒皮是极尽刻薄狠毒虐待工长的大地主,但孟令骞在实地访问中却得知,周扒皮的资产在整个县城要排到2000名开外,划分成分时,他只是被定为“富农”。故事中被周扒皮虐待的高玉宝,“在实际生活中也并非没有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孟令骞一直生活在家族的阴影和屈辱中,他很自卑,“心里一直想了解太姥爷家族具体的罪恶是什么”,于是才有了

从“半夜鸡不叫”到“半夜鸡不叫”的另一种历史讲述。

“知道了这些,人们还会认为历史只是学者们的事吗?”郭于华反问。

不过,在国内对于这种相对草根的底层生活史的研究,迄今仍未有形成一个学科。即使是田野调查中极为重要的口述史,也“往往只是作为对社会学的一种补充材料出现”。杨念群指出,这是当前的史学空白。如何在个体叙述之上,“找到一个公共平台,现在看来还很难”。

然而从某种角度看,当个人的私密体验可以作为自传在网上流传时,一个人的回忆就得以从“私”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不能要求这种表述完全真实,”郭于华说,“但不同角度、不同面向的叙述,就上历史出现了多声部的可能”。

无疑,互联网有助于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正如郭于华所认为,“是网络开创了关于草根历史的新时代”。

尽管邹洪安毫不熟悉网络,但他80年的人生却在虚拟世界里被人们阅读。有时,他写下的那些遥远年代的故事,让如今的一个年轻人感到大为惊讶,他们会惊呼“被雷倒了”。

像“雷”这样的网上用语,这位老人是看不懂的,正如他也不能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将“东西”称为“东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晚年,经由网络,加入到另一个声部的历史合唱中去。

摘自《中国青年报》

1952年10月,西姆卡汽车公司总部的摩天大楼里,总裁戈泽泽倒在会议桌上,紧接着被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所有人吃惊不小:心肌梗死。七十高龄的戈泽泽仿佛听到了主的召唤,从病榻上睁开眼睛,他就知道自己的余生所剩无几了。从此,他便辞去了公司里的日常事务,每天拖着病患之躯,趴在书桌里写啊写。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因其居所简出加上行踪诡秘,没人知道他在忙什么,在写什么东西?

500年发展规划书

《费加罗报》主笔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决定举行有奖竞猜活动。悬赏的问题是:“世界第一CEO生命中最后一件事是什么?”第二天,明信片 and 邮件便雪花般地飞来了。回答千奇百怪,但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财产分割,二是继承人。

戈泽泽竟奇迹般地活过了13个月!而此间,人们的对于“最后一件事”的猜测一

直纷纷不断。戈泽泽迟迟不咽气,大大地吊足了众人猎奇的胃口。

第二年暖春,戈泽泽终于病榻,脸色蜡黄,嘴唇微微地一张一翕,长于正记录着他的遗嘱。待圈上最后一个句点,气若游丝的他看着厚厚一沓“心血”,露出一丝久违的笑容,便驾鹤西归了。

第二天,这份资料以原版印刷的形式刊登在了《世界

报》上——《西姆卡公司今后500年发展规划书》。从人事调到产品研发,再到厂区规划、市场开拓……无不一俱全。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世人最为关心的两点,他只简单地提了提:1.6亿的私人遗产一半捐给红十字会,一半用作公司的科研经费;至于接班人,则由董事会投票选出。

这让所有人为之汗颜和深深地佩服。拉丁西政府决定授予其象征最高公民荣誉的骑士勋章。

摘自《年轻人》

中国家长的困境

因为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不少学生因此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的说法是,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最少直接的原因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不断下降。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人数比去年增长4%,考生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将更大,预计每100个考生中有62个会被录取。高校扩招的盘子和总量仍在增长之中。

这似乎让家长和学生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上大学不再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毕业将迎来一个险峻的时期。

“就业难和高校扩招没有因果关系,甚至就整个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总体需求而言,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位持这种论调的专家说,“大学以面向未来为使命。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和市场脱节,而是要求大学尽最大努力去揭示那些左右市场的因素和力量,为人们的未来生活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或者创造更好的条件。”

公众对于教育高成本与就业难的双重无奈现象无能为力,这一恶性循环还将继续。

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是:软教育、硬投入、争夺教育资源。现在正是9月份入学前的“活动期”,不少家长开始了他们最为忙碌的日子。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的入学年龄只差几天,她不得不为孩子进入一家实验小学发愁:“中间人已经找好关系了,学校也一直答应着,但就是没有下文。”

即便是在北京偏远的郊区,民营性质的幼儿园也四处开花,但仍赶不上入园的速度,稍微好点的幼儿园早就爆满。几千人的入园费对于家长来讲,是一笔不得不给的投入。

但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实在规划得怎么样,包办孩子的教育战略,到为孩子选择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大学专业后,终于出现了分裂:许多人在毕业时放弃专业改行了。

《家长是最好的老师》、《哈佛女孩刘亦婷》、《100个中国孩子的成功报告》,乃至新概念作文、奥数竞赛、国际才艺表演,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教育成功学”在作祟。

望子成龙的家长播下龙种,收获的却可能是跳蚤。

那些不堪忍受教育体制的人,成为教育体制的

名流故事

谁也无法否认,他们共同生活的九年是肖邦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创作阶段,是他最光辉的创作力高峰期。而肖邦与乔治·桑分手之后,他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一部重要的作品。

肖邦和他的情人

特殊的女性。她蔑视传统,饮烈酒,抽雪茄,爱骑马,喜欢男装,骂起人来满口粗言秽语,谈情说爱时却百般柔情,千般风流。她是一个多情的女人,已经30多岁了,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与诗人缪塞刚刚分道扬镳。她对男人了如指掌。她喜欢肖邦,就有办法使肖邦喜欢她。

肖邦是个男子,却有女性气质。他面色苍白,身体纤细,体质柔弱,忧郁伤感,常常由于激动而疲惫不堪。他还不到30岁,他的天才备受女人的崇拜。但是,两次失恋使他怀疑女人的情感。他在孤独中生活,又无法摆脱对爱情的渴望。忧郁的阴影笼罩着他。他感到自己创作力在衰退,思想变得懦弱,想象变得苍白,灵感渐渐枯竭。他需要一种强烈的有活力的爱情来唤醒他心底的热情,在他无力的手指中重新注入艺术的生命力。对于艺术的忧虑不安和对命运创造力的忧虑不安犹如双重的阴影和双重的枷锁,压抑在他心头。

肖邦那干枯的心期待着爱情雨露的滋润。肖邦的感情防线在桑夫人的进攻下很快就全线瓦解。他们相爱了。他们常常在奥特尔区约会,桑夫人在那儿的一幢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李斯特和他未来的夫人则租了另一个房间。他们四个人常常一起用餐,一起出入沙龙。

整个巴黎为之惊讶。善意的劝告和恶意的攻击都无济于事,他们情投意合。他爱上这个女人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可悲的。他需要这

样的女人。这个男子气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气的男人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真正的朋友们都为肖邦高兴,因为爱情不仅使他显得英俊健康,而且情绪活跃,感觉良好,充满自信。过去的神情恍惚、忧郁伤感竟然一扫而空。他的创作才又获得了非凡的活力。肖邦来到桑夫人在涅兹的庄园。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乡村,与肖邦的故乡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味,在风景优美的草原上,坐落着这幢石头房子。晚上,从田野的远处传来牧羊人粗犷、奇特的歌声,这些都使肖邦激动不已。作家、诗人、艺术家们也常到这儿来做客。肖邦在这儿享有最大的权利,他占有两间幽静

的房子,一间摆着专门为他买来的钢琴、写字台和沙发;一间是恬静的卧室。在这里,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肖邦多年来第一次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高兴、最幸福的时期了。肖邦创作上成熟、智慧和力量的全盛时期也终于来到了。如果没有乔治·桑的爱情,没有受到乔治·桑周围那一群大作家朋友的影响,他卓越才华可能也不容易开花结果,达到高度的艺术境界。在这个时期里,他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肖邦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乔治·桑没有怨恨,只有爱情,他不能忘记乔治·桑。

肖邦与乔治·桑的爱情,是一次成熟的爱情,开花结果的爱情,给予他艺术生命力的爱情。他不能忘记乔治·桑,不能忘记他那创作力高峰期的光辉岁月。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说:“我真想见她一面。”

摘自《诱惑与冲突》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zbw@163.com

给自己一条冷板凳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相继发表以后,各种宴请、采访、签名就包围着他,使他极为苦恼。这时,托尔斯泰正准备写一部揭露和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长篇小说《复活》。为了专心致志地写好这本书,有一天,他把佣人叫到跟前,对他说:“从今天起,我‘死’了,就‘死’在我的房间里。不过别忘了给我送饭。”

从此,托尔斯泰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集中精力写作。每当有人来拜访他时,庸人便显出十分悲痛的样子对客人说:“先生死

了,死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渐渐地,社会上都说托尔斯泰神秘地死去,来访者因此而绝迹了。9年过去了。1891年,世界文学史上的巨著《复活》脱稿,作者托尔斯泰也同时“复活”了。

醉心于鲜花和掌声的小神童仲永,像一颗流星,在人类文化的天空中一闪即逝;耐得住寂寞的托尔斯泰,以他的皇皇巨著长久地占据着人类的精神领空。托尔斯泰的“死去”和“复活”,形象地告诉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学会给自己一条冷板凳。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如何进步,避免挨打,这是每一个暂时落后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李小龙初学武术时,也避免了被动挨打的命运,但他的超人之处在于挨打之后不是退缩逃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韬光养晦,独善其身,而是被被动为主动,继续到胜利者和高手那里找打,在最短的时间内缩短彼此的距离,在超越自己的同时也领先他人。

李小龙开始学咏春拳,初有所得,稍感得意,却被另一家武馆的一个端茶倒水的小生用“王家腿”轻轻地打倒在地。他备感羞辱,也深感震惊,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外。他没有躲起来独自发奋练拳,待到感觉良好再去削耻,而是在挨打之后毫不削减自己的勇气、信心和锋芒,轻轻地抖落掉伤痛,前往这家武馆主动找打,请那个小子再次痛打他一次。那他在找打的过程中终于悟透了对拳术的精华之处,比较出了咏春拳和“王家腿”的区别:前者的优势在于速度,长于黏打,越近越容易发挥特长,打在人身上就像锤子凿

变了,死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变被动挨打为主动找打,就是要放下虚荣心和羞耻心,不搞隔靴搔痒式的自我修炼,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地去找对手请教切磋,提高进步,在最短的距离和时间内告别落后,远离失败。

找打的李小龙

它是一样;而后的力量在于凶狠,动作幅度大,擅长拉开距离隔人打,待对手出现空当,一脚便踢向对方,踢在人身上一则如同被大棒子砸了一般。

找打可能依然会输,但这种输在本质上跟被动挨打不同,因为它是主动找上门的,是前来寻找暂时落后的原因的,输了却得到更多,切身体验彼此的差别,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准症结,最终“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最快的速度直截了当地提高自己,超越自己,别人再也不能够轻易地打倒自己。

李小龙主动找打的结果是,他将“王家腿”的精华之处运用到咏春拳上,改善和提高了自己的拳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对手变成手下败将。大大出乎对手和师兄们的意料。

师父告诉李小龙:与其说武术是练出来的,不如说

了,死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那些最终成就了伟业的人,都是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托尔斯泰的冷板凳一坐就是10年,其实,音乐大师贝多芬坐冷板凳的工夫也不浅。1814年10月,贝多芬创作的《光荣的瞬间》、A大调《第七交响曲》和《惠灵顿的胜利》在维也纳公演。普鲁士皇帝、奥地利女皇、俄国皇后以及其他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都出席了这次隆重的音乐会。这时的贝多芬已名震四方,许多人千里迢迢来到维也纳,就是要见见这位音乐巨匠。可是,他们想尽了办法也

没有见到他。音乐会,他不去;到他家去吧,他又在几天前搬家了,而他的新居在何处,谁也不知道。有人做过统计,贝多芬在维也纳的三十几年里,共搬了79次家。贝多芬这样频繁地搬家,正是一次次地在让自己坐冷板凳。

是,的人生来就是向往红尘的热闹的,有谁愿意去坐那冰冷的板凳?然而,茫茫人海,悠悠古今,多少人的抱负在灯红酒绿之中沉没,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在名利的喧嚣中消隐!而适时给自己一条冷板凳,其实就是看淡名利,远离浮华,守住自己最初梦想,守住创造的激情,守住灵魂深处的宁静!

摘自《成功之路》

所谓“力从地上起,拳从心中发,节节能发劲,攻守寸位中”的寸拳,不但能够一拳打烂木板,而且拳拳都能打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变被动挨打为主动找打,就是要放下虚荣心和羞耻心,不搞隔靴搔痒式的自我修炼,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地去找对手请教切磋,提高进步,在最短的距离和时间内告别落后,远离失败。这种精神不但可以让人领先一个对手,而且能够使人超越更多的人,包括自己。

来到美国后,李小龙继续实践自己挨打不如找打的练武精神,向空手道高手、柔术大师、拳王们一一找打,取百家之长,补自家之短,打破当时武术家们闭关自守的时代局限,创造出练武者共享的截拳道,成为后世无人不敬重热爱的创新武术家。

摘自《辽宁青年》